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中国传统译论

译名研究

朱志瑜 黄立波◎著

通天塔，典出《圣经·创世纪》：创世之初，普天之下的人类同操一种语言，由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塔（Tower of Babel），以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上帝得知后，对于人类的骄傲感到异常的恼怒，便将人类拆散到世界各地，分化他们的语言，于是人们无法交流，最后筑塔的梦想成为泡影，人们也从此不再沟通、交谈与倾听……自那时后，通天塔就成为混乱的符号，尤其是语言混乱的符号。然而在今天，新的通天塔是值得建造的，但这决不是要凸显人类的傲慢态度，而是希望在语言彼此分隔的情况下实现人类的沟通。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试着寻找克服语言障碍的途径，以求实现不同文化圈内人们之间的沟通，于是就有了翻译。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中国传统译论

译名研究

朱志瑜 黄立波◎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译论——译名研究 / 朱志瑜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38-9499-0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翻译学—研究—中国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0421号

中国传统译论——译名研究

编 著 者 朱志瑜 黄立波

责任编辑 吴韞丽

装帧设计 谌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499-0

定 价 39.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支持项目

主 编：张佩瑶（香港浸会大学）
张 旭（福建工程学院）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黎翠珍（香港浸会大学）
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
Robert Neather（香港浸会大学）
莫 艳（湖南人民出版社）
Lydia H.Liu（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Sean Golden（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罗选民（清华大学）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
单德兴（台湾中央研究院）
朱志瑜（香港理工大学）
陈德鸿（香港岭南大学）
张南峰（香港岭南大学）
朱纯深（香港城市大学）
杨承淑（台湾辅仁大学）
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 辉（深圳大学）

《通天塔丛书》总序



通天塔,典出《圣经·创世纪》:创世之初,普天之下的人类同操一种语言,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塔(Tower of Babel),以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上帝得知后,对于人类的骄傲感到异常的恼怒,便将人类拆散到世界各地,分化他们的语言,于是人们无法交流,最后筑塔的梦想成为泡影,人们也从此不再沟通、交谈与倾听……自那以后,通天塔就成为混乱的符号,尤其是语言混乱的符号。然而在今天,新的通天塔是值得建造的,但这决不是要凸显人类的傲慢态度,而是希望在语言彼此分隔的情况下实现人类的沟通。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试着寻找克服语言障碍的途径,以求实现不同文化圈内人们之间的沟通,于是就有了翻译。

从源头来考察,在古希腊语中,“翻译”意指“carry across”(带过),它与“metaphor”(隐喻)一词表示的是相同的意思。换言之,在命名上,“翻译”一词就带有某种难以言表的隐喻性,同时也隐含着某种跨越性行为——跨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边界,然后走进另一新的疆域,由此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因此,历来人们或是将翻译定义为两种语言间的相互转换,或是将翻译定义为不同符号体系间的相互转换,或是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间的转换行为。然而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翻译本身是否具有可能?翻译的功能或作用是什么?这些我们至今未能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正因如此,当今译学研究界的学人仍需继续承担起搭建新时代通天塔的重任。

如果说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诞生的现代翻译研究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而今在 21 世纪的翻译研究又该走向何处?其本身如何洗新革面、奋发

自为?这些值得我们深思。为此,我们推出《通天塔丛书》。我们希望能够本着开放的心态,放眼世界译学研究的大潮,力求具有原创性和学理深度;力求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注重把握国际译学研究的前沿,突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系统性;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用西方现当代的翻译理论来解决中国翻译实际问题,以求能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在世纪之初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创建人

黎翠珍

2011年8月26日于香港

前言



传统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强调与实践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著。其中译名问题的研究最为突出。

和拼音文字之间的翻译相比，象形表意的方块字成为翻译外来名物概念的一个重要障碍。拼音文字使用的字母仅是代表语音的符号，而汉字除了可以标示外来语音之外，本身还有意义；翻译时选词不慎会带来歧义或误解，此其一。其二，拼音文字之间的音译比较单纯，只要转换字母拼法（有的甚至照搬过来，连字母都不必转换），就基本可以做到语音对应。但是汉字音译带来的问题比意译更复杂；以至专用名词如人名、地名，在中国很难做到译名统一。

专用名词音译涉及所谓“名从主人”的问题，即原名属于哪国，就按哪国语言标音。理论上这一点在清末民初时期就达成了共识，但做起来异常复杂。现今世界的通行语是英语，很多非英语国家地名在世界媒体中以英语发音标示者多，而各国本国的语音却知者甚少。中国译者掌握的外语以英、法、西、俄等几个语言大国为主；直接从小语种（如东欧语言）翻译的作品占极少数。再者，译者不可能了解世界所有国家的语音，所以很多人名、地名都以英语发音为准翻译。这样，所谓“原名”就有英语名还是源语名的选择。这属于世界性的、各国译名都要面对的选择。

除了原名不统一之外，中国译名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译名语音不统一的问题。中国方言众多，译者，尤其早期译者，通常用各自方言标示外来语音；另外，汉语同音字太多，同一外来音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同

音异字的译法。因此一名多译的现象屡屡发生。

由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的译名研究比任何欧美国家都复杂；学者在统一译名上花的精力远远超过西方同行。

从汉唐佛经翻译开始，经过明清基督教、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人文社科一直到二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各时代都有大量学者参与讨论译名问题。早期佛经译名（当时称“翻译名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虽然理论上留下来的争论不多（相对翻译策略的讨论而言），玄奘和赞宁的总结简明扼要，为后人奠下了基础。明朝利玛窦独出心裁，用他特有的方式调和基督教信条和儒家经典，一度也曾为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接受。他的调和方式后来又被新教圣号（上帝之名）翻译借用过来。明清科技翻译问题主要就是译名问题。他们的译名方法参考了佛经汉字加偏旁做法，基本解决了科学名词翻译的需要。和宗教和科技相比，人文学科的译名更加复杂，因为很多专业术语在原文也是生活中的常用词汇，这增加了译名的困难。严复是近代影响最大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在译名方面，他的很多译法被同代人批评，以后又被后来者否定。二十年代从文章数量上说，是译名讨论最发达，争论最激烈，提出方法最多的时期，但是几乎每次争论都围绕严复的方法展开，可见他的影响之大。到了二十年代末，译名的方法原则基本确立，虽然实践上仍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主要集中在译名统一方面。

本书涵盖内容包括从东汉到1949年，中、外学者在中国、用中文发表的探讨译名的文章，所以很多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傅兰雅、陆佩等人的文章也在讨论之列，因为他们用中文发表的文章与中国翻译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中国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在国外用外语发表的类似文章我们就不讨论了。译名的讨论沿着历史，从具体一个领域推广到一般，再回到具体领域一路传承下来，每个时代讨论的内容都和前代有密切的联系，从无间断。我们按时间顺序，以主题为纬，个人论述为经，编织成一个译名网络。为节省篇幅，选材行文刻意从简；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随手可得，所以各章抽去时代背景、作者传记等资料。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析译名方法原则的讨论，下编总结机构（包括官方和非官方）为统一科学译名做出的努力。最后附录是历代学者总结出来的译名方法，可为译名教学提供参考。关于下编“译名统一”的问题我们再多说几句。

下编讨论以机构为依托的科学译名统一活动，以区别于上编中以个人为主的关于译名原则及方法的讨论；上编虽然也有学报、杂志主持的讨论，但作者是个人。两编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下编只涉及“科学”译名统一。译名“方法”与“统一”二者之间有时界限也十分模糊，讨论方法时难免涉及统一的问题，因为后者毕竟是前者的目标；同样，讨论统一译名，往往也会以翻译方法为开端。我们也曾尝试对译名原则、方法及技巧和统一原则做泾渭分明的区分，结果发现十分困难，因为各类情况错综复杂，有些关于原则的讨论，从内容看实际上是具体的翻译方法，有的说是讲翻译方法，实际却是一些统一译名原则，这几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厘清。但下编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均围绕以学部、学会等组织机构为依托的科学译名统一展开，作者可以说是机构。其中个别人物关于统一科学译名的讨论表面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实际还是依托于一定的机构和组织，如杜亚泉关于化学译名的讨论背后是亚泉学馆及其创办的《亚泉杂志》，虞和钦的讨论也代表清政府学部的图书局。

科学译名统一讨论依然以时间为顺序，一方面便于文献梳理，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阅读。其中一些时期之间略有穿插，这是因为早期的科学译名统一并未有一个官方机构协调此事，个别时期存在不同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但他们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即统一各类科学名词。

我们起初对统一科学译名的文献数量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但一旦深入进去才发现，此类文献不仅数量十分丰富，而且其时间跨度之大，参与主体之众、讨论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真让人有“别有一番洞天”之感。

这一部分仅直接参引的文献就有一百多篇，尽管如此，还有部分文献我们无法找到，不过通过二手文献已对其有所了解。一些文献的篇幅及其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个别文献虽然当初是刊载在杂志上，也长达一百多页，其中附表百余个，甚至还分期连载（如《科学》杂志所刊载吴承洛的《有机化学命名法评议》一文，参见下编“科学社团的译名统一活动”）。

时间跨度 80 多年，其间涉及的一些人物或机构，他们的姓名或名称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早已显得十分陌生，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谓贡献卓著！例如早期同文馆及制造局中的外国传教士教习丁韪良、

傅兰雅等，来华传教士民间组织“益智书会”和“博医会”的林乐知、伟烈亚力、麦嘉缔、狄考文、高似兰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今天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记忆只是一些传教士、洋教习。更值得钦佩的是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尚处动荡、时局尚未稳定之际，一大批的科学家、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着手于最基础的工作——建立中国的科学话语体系——开始为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谋划前进的道路，如化学家任鸿隽、郑贞文、吴承洛、曾昭抡，数学家胡明复、遗传学家冯肇传等等。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当年统一译名之艰辛，最主要是可以感受到他们作为学者的魄力和胸怀，以及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术语来发展科学，通过发展科学来强大自己的国家。

尽管我们无法一一穷尽所有文献，但这一部分已大体上勾勒出中国科学译名统一的进程，从这一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统一科学译名的讨论，起初是一个就翻译问题的讨论，即讨论具体的译名方法和原则，之后由于各类组织、团体与政府的参与而逐步上升为社会活动，直接关乎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书是“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译名部分，从搜集资料到成书，前后十几年，中途获得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资助（B—Q28Y）。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得到张旭和张瑞的大力协助，附录中的翻译方法、原则由桑仲刚总结完成，最初包括学者、方法、译例等，很详尽，后来我们简化压缩成现在的样子。对于这些学者的帮助，我们在这里表达真挚的谢意。最后要感谢丛书主编张旭教授。答应他很久了，由于资料太多，特别是科技定名委员会等材料，问题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至今才得以完成交稿，而实际上还存在很多资料梳理问题没有解决。

上 编 译名原则与方法

第 1 章	翻译名义:佛经术语的翻译	/003
第 2 章	《天主实义》: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015
第 3 章	傅兰雅论科学术语翻译	/020
第 4 章	晚清《万国公报》关于圣号翻译的争论	/026
第 5 章	清末外来人文术语的翻译	/034
第 6 章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论译名	/040
第 7 章	章士钊主持的有关翻译名义的讨论	/048
第 8 章	胡以鲁论译名	/057
第 9 章	朱自清(佩弦)论译名	/062
第 10 章	五四时期关于专用名词的音译标音法的讨论	/071
第 11 章	二十年代前期关于译名的几次讨论	/086
第 12 章	二十年代后期的译名问题	/099
第 13 章	三四十年代论译名	/107

下 编 科学译名统一

第 14 章	晚清时期中外译书者合作统一科学译名的尝试 (1866—1890)	/119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	/119

	第二节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121
第 15 章	晚清时期外国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译名统一的活动 (1877—1915)	/131
	第一节 益智书会	/132
	第二节 博医会	/135
第 16 章	中国人独立的科学译名统一开端(1900—1910)	/138
	第一节 《亚泉杂志》	/139
	第二节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文典处	/140
	第三节 编定名词馆	/142
第 17 章	民初关于科学译名统一的讨论	/144
第 18 章	科学社团的译名统一活动	/147
	第一节 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杂志	/147
	第二节 《工程》杂志	/154
第 19 章	从医学名词审查会到科学名词审查会(1916—1926)	/156
	第一节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医学杂志》	/156
	第二节 医学名词审查会	/157
	第三节 科学名词审查会	/160
第 20 章	从大学院科学名词统一委员会、教育部编审处到 国立编译馆(1927—1949)	/164
	第一节 大学院科学名词统一委员会(1927—1928)	/164
	第二节 教育部编审处(1928—1931)	/165
	第三节 国立编译馆(1932—1949)	/165
第 21 章	科学译名统一活动发展概述	/172
○ ● ○	附 录: 译名原则、方法与统一措施概览	/176
○ ● ○	参考文献	/182

上编

译名原则与方法

Yiming Yuanze Yu Fangfa



- 翻译名义：佛经术语的翻译
- 《天主实义》：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 傅兰雅论科学术语翻译
- 晚清《万国公报》关于圣号翻译的争论
- 清末外来人文术语的翻译
-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论译名
- 章士钊主持的有关翻译名义的讨论
- 胡以鲁论译名
- 朱自清（佩弦）论译名
- 五四时期关于专用名词的音译标音法的讨论
- 二十年代前期关于译名的几次讨论
- 二十年代后期的译名问题
- 三四十年代论译名

第1章

翻译名义：佛经术语的翻译



“翻译名义”是佛经翻译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外来佛教术语的定名问题。佛经翻译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的运动，翻译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用汉语来表达一种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宗教思想。佛经翻译家和理论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一是句法，二是词汇。在句法上，早期译者采取“质”的做法，特意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创造了很多新的句子结构，中后期开始留意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于是译文逐渐趋向“文”。但是在理论上，始终是“质”派占上风。在词汇方面要解决的困难主要是术语的译法。关于术语翻译的论述，在佛经翻译时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长篇巨著就有《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法苑珠林》等。此后明清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科技翻译，严复的人文、社科翻译以至民国以后，历代学者对术语翻译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直到今天，术语仍是中西翻译实践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翻译名义”是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个论题。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视名义问题，大概是中西语言的语音系统和组合方式差别大、文字书写形式完全不同的缘故^①。

翻译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用旧语言表达新事理的问题。宋僧释法云说的“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故以此方之经而显彼土之法〔‘法’作‘事’解〕”就是这个意思（1994：626/一）。其中“所有”和“此方之经”是指“旧”的本土语言，“所无”和“彼土之法”就是“新”的、中国

^① 中国翻译理论界对翻译名义的重视，从 CAJ Full-text Database 所收文章中可见一斑。1999 年至今，仅篇名包含“译名”的文章就有 475 篇。

原来没有的他国事理。这“新”与“旧”，或“语言”与“事理”之间的矛盾是翻译中重要的，也是必须克服的障碍。一种语言一般属于一个民族，这是语言的民族性。事理可能为一个民族所独有，也可能是普遍的；就是说，它有民族性的，也有世界性的。把一个民族所独有事理翻译给另一个民族，对后者来说这个事理就是我们说的新事理。翻译要使用语言，而且只能使用后者的语言（否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这后者的语言（目标语）就是我们说的旧语言。一新一旧之间会出现矛盾冲突。实际上即使是翻译世界性的事理也不是完全不会出现冲突。事理是要用语言表达的，语言既然是民族性的，而且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以至风俗习惯等等千差万别，对于同一事理，各民族又可能持不同的态度、怀不同的情感，所以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是同样的表达方式有时也会带有不同的含义，引起不同的联想。

几乎所有的翻译都会遇到新事理的问题，特别是中西语言之间的翻译。为了表达这些新事理，在语言上就要有所创新。所以翻译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的语言。译者在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是我们说的“旧语言”。创新发生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句法和词汇。翻译时如何创造新的词汇就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翻译名义”问题。在现存最早的讨论翻译的文章《法句经序》里，作者支谦^①就注意到了名义问题，所谓“名物不同，传实不易”（1995：273）。翻译名义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有关“名实”（即名称与实际现象的关系）的争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对翻译本身来说，要创造新的词汇，名实问题也是回避不掉的。

翻译名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来事物要译音还是译意；二是如果译意，用什么方法。音译也涉及不同的方法，但远没有意译复杂。音译比较单纯，只翻声音，不翻意义，所以古代称之为“不翻”，具体方法下面再谈。先说意译。意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译字面意义，如“计算机”（computer）、“超级市场”（supermarket）的“超级”二字、“猎头”（headhunting）；一类是译隐含的意义，即从原文字面上看不出来的意义，比如把上面三个英文词译为“计算机”、“自选市场”、“人才开发”等。翻译隐含的意义又有多种形式。一般用一个字面意义不同而功能（无以名之，

^① 《法句经序》收在《出三藏记集》里，作者不详，据汤用彤等考证，作者为支谦。

暂且用这个万能的“功能”吧)相同的词;也有释义性的,就是用短语或句子来翻译或解释原文的一个词(也叫“重写”、“改写”或“编译”)。在翻专业术语的时候,由于短语和句子很难重复使用,所以一般不用释义的方法,佛经里几乎没有。还有一种翻译隐含意义的方法,是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个与原文字面意义不对应,但可以类比的词,以期达到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效果。这就是美国理论家奈达(Eugene Nida)所说的“动态对等”。早期佛经讲说也用这种连类的方法,并称之为“格义”。当然,“格义”的方法仅用于词汇的翻译,而“动态对等”所涉及的层面相对要广得多。

以下我们通过研究佛经翻译里关于翻译名义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在翻译的过程中,外来思想与本土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和妥协办法,同时检讨佛经翻译理论所使用的语言,希望能对现代翻译研究有些参考价值。

佛经里有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佛教兴起时的语言政策问题;季羨林引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有两个比丘去见佛陀,对他说佛弟子中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语言,这样“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他们建议统一使用梵文。佛说:“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季羨林,1991a: 36)。其实佛弟子说的“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指出了翻译的根本问题——是翻译就会有损失,佛祖一句话否定了弟子的建议,但却无法保证“义理不失”。在另一个版本里,佛还说:“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指梵文]而欲杂糅佛经。[……]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季羨林,1991a: 37)。禁用梵文是佛教对当时使用梵文的正统国教婆罗门教的反抗(季羨林,1991b: 54)。当然后来佛教地位上升,婆罗门教逐渐式微,这项禁令也就取消了,因此出现了梵文的佛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1. 佛经是允许使用不同语言(包括方言)的,也就允许翻译,这样利于传播;
2. 佛教不重语言的华美;
3. 佛不承认梵文的权威,并认为使用梵文就是“毁损”佛教。

应该注意,佛允许使用外族语言,但不允许使用“外道”的语言;这